

由中国“社会心理学”迈向 “中国社会心理学”

——试图澄清有关“本土化”的几个误解*

杨 中 芳

前 言

最近几年来，大陆心理学界流行争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应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在目前中国社会心理学正在寻找发展方向之际，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本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大家对这个名词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还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以致使赞成及不赞成的两方常常在争得面红耳赤之后，才发现原来彼此观点相当一致，只是各方对“具有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的解释有不同看法。

另外一个使这场争论变得更白热化的原因，是许多人将中国社会心理学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与清末以来，中国人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正常之争连在了一起。这个永无止境的争论就是：中国到底是要“全盘西化”还是要“洋学中用”，把那些赞成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人，看成是与“洋学中用”的老顽固一样，不肯全面解放自己的思想。

1986年，我根据自己过去十年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学的经验，曾写过一篇论文呼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杨中芳，1987）。在文中，我曾主张慎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两年之后的今天，我发现我已经被许多人划为属于赞成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那一派里。1988年7月份在青岛我参加了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论与教学专业委员会”所举办的全国学术年会。在会中，我首次比较全面地听到许多与会人士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正反两面看法。我自觉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我的“本土化”到底是什么？它与“具有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想，首先我应该就一些人对“具有中国特色”这个名词所提出来的异议，作一番解释。因为我认为许多人对它的批评实源于对这个词的误解。在为“具有中国特色”正名之后，我才把我所提议的“本土化”概念与大家统一了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之间的异同及关联简述一下。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几个误解

根据我所接触的资料作归纳，反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人大约有四个

* 本文是作者参加1988年7月24日至27日在青岛举行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教学专业委员会”全国学术年会之后，有感而发的。在此会议期间，与会同仁曾热烈地讨论了有关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本文即是就当时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作一些澄清及说明而成。作者在此感谢与会人员所提供之资料，并相信这里所提出的观点，许多是综合他们的宝贵看法及高见。但是本文文责由作者自负。

主要论点：

1. 中国人也是人，与世界上其他人究竟还是共同点多过不同点。如果只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那可研究的题目实在很少。何况，我们为什么要只研究人类的差异性，而不研究人类的共同性呢？

2. 搞“具有中国特色”，就是不想学习外国经验，排斥外国理论，又想关起门来搞“土法炼钢”。过去的经验教训还不够吗？

3.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何须刻意地先接受什么、排斥什么？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公开地吸收各方长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地，我们的研究就会去芜存菁，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

4. 到底什么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是指古代传统的东西吗？又要发掘老古董来建立中国人的骄傲吗？

以上四项批评，我觉得都相当中肯。它们的论点也基本上正确及合理。这里唯一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批评是基于一个对“具有中国特色”这个名词的误解所产生的。提出这些批评的人，认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是指：

1. 专门研究其他文化及国家没有的。如果美国有“从众行为”、苏联有“从众行为”，中国也有“从众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研究这个题目。

2. 排斥外国的概念及理论，一切用土法炮制出的研究成果，才是“具有中国特色”。

3. 只要是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做任何研究，做久了，堆积出经验及成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

4. 只有古代心理学研究及理论，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

对误解的澄清

事实上，许多赞成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人，可能都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以上的这些定义皆非他们所指。我想大家心目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是指一门真正“描述及解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知识系统。而这个知识系统要能真正对中国人有用，帮助中国人的生活能过得更好。因此：

1. “具有中国特色”绝不是指钻牛角尖式地专门研究中国人特有而别人没有的社会行为。其实一个行为是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是一个实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坐在椅子上可以想出来的。所以在没有做研究之前，根本不可能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有，哪些不是中国人特有。

2. “具有中国特色”也绝不是“闭关自守”，排斥所有的外国概念及理论，而是有选择性地把能帮助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部份留下作参考，但不是盲目地去接受及采用。

3. “具有中国特色”也并不是指经过若干年研究后，“试验及错误”（trial and error）的结果。研究及发展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学似乎要找出比这种策略更有效率的方向，才能使它有一个较快速及健康的发展，最终使它成为一项对中国人有用的学问。

4. “具有中国特色”也并非刻意去研究老古董。但是，如果古代心理学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现代”中国人的看法、想法及作法的话，那么老古董也要去发掘、研究。

基于以上的澄清，我认为发展以上所定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事实上是：

1. 要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能够源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及中国人的实际行为的关心

及兴趣；

2. 并将社会文化对个人心理系统的影响考虑进去；

3. 探讨个人的社会心理现象与行为，不管这些现象与行为是中国人独有的，还是与其他民族所共有的；

4. 任何的外国概念及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已的社会行为的了解，都是应该吸收的。因此在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时，博览各国各家各派的理论是必须的。但是应注意不要让它们局限、架空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与现实生活脱节。

如果我上述的这个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确实接近那些主张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者心中对这个词的理解，我想前面我所述的那些反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学者可能也不会再反对了。因为，他们反对的立论点已不再存在。

什么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

其实在大陆流行的这个“具有中国特色”一词，与在台湾流行的“中国化”一词，及我在论文中所用的“本土化”一词的意义都有很紧密的关联。先让我在这里将“中国化”与“本土化”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及它们在港台发展的经过述说一下，再回来讨论它们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关联。

“化”字本义是指由一个“原本”状态到另一个“终极”状态的过程。通常，大家将“终极”状态冠在“化”的前面，而将“非终极”视为“原本”状态。所以，“中国化”是指由“非中国”状态变成为“中国”状态的过程。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自然是指将中国社会心理学由“非本土”变为“本土”状态的过程。那么，什么是“非中国”、“非本土”状态呢？这可能要从“中国化”与“本土化”在港台开展的历史说起。

港台学者之所以会提出“中国化”及“本土化”的概念，主要是出于这两个地区20多年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痛苦经验。这两个地区的心理学，与世界许多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都是深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不管是概念及理论的采用，或是研究人材的训练，都不脱西方的窠臼。如果这种学习及采纳确实令我们很满意地了解了中国人的行为，那自然没得说的。但是，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工作者，我们经常发现西方的理论未必能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帮助西方学者验证他们的理论方面，可谓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在帮助了解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行为方面，则常有“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感觉（杨中芳，1987）。目前我们的社会心理学虽然是用中国人作研究对象的，但是由于它仍然停留在借用别人的概念，来描述一些社会心理共性的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深一步了解中国人的具体及实际行为。因此，它不能被称为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充其量，它只能被称为是中国“社会心理学”。有感于大家共同有的这种挫折感，港台学者在1980年，就开展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运动。

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非中国”及“非本土”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状态，即是指由于作研究时，过份依赖西方的概念、方法及理论，以致使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处在“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人的看法、想法、及作法”的状态，因而不是“真正描述及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学问。而“中国”及“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状态，就是指“能够真正描述及解释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状态，亦即“中国社会心理学”。而这个“中国化”及“本土化”过程的“终极”状态，正和大陆目前在提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

理学，不谋而合。所以港台所提倡的社会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与大陆所提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关系是：前者是一个过程；后者是终极目标。其用心及意义则是完全相同。

根据以上的解释，虽然大陆、台湾及香港这三个地区采用了不同的名词，但是大家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终极状态却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它能成为真正描述及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知识体系，并真正成为对中国人有用的一门学科。为此，今后三个方面的学者实在应该多交流多合作，共同为一致的目标而努力。在此，我首先建议大家先统一名词。我建议我们一起采取“本土化”这个概念，我们的理由有以下四点：

1. 用什么名词并不重要，只要大家是用同一个名词，而大家用那个名词时的意义要大致相同。既然，学术界的推行“本土化”是一个世界潮流，不少国家都是在用“本土化”这个名词来泛指这个从本土角度来彻底了解自己文化的社会行为的运动，我们就不如接纳这个能与多国人士彼此沟通的名词。

2. 由于中国语言的含混性，“具有中国特色”中的“特色”两字可以有许多的解释。最常用的两个是“只有中国才有的”和“对中国人行为指标的平均值的描述”，后一解释带有特征及基本性质的意义。而这两种解释都并不真正代表我在前面所定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这一主张的含义。所以为了避免混淆起见，不如不用这一个词。

3. 至于“中国化”一词，正如何秀煌(1982)指出，也是一个意义较含混的名词。因为无论“中国化”的“原本状态”（非中国）或“终极状态”（中国）都难捉摸其真义。现时的中国“社会心理学”虽差强人意，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非中国”的，只是我们还不能将中国二字放在引号里面罢了。至于“中国化”的终极目标，亦即“中国”状态，不免也要使中国社会心理学成为“中国式的”“中国特有的”的意味。这样可能也容易引起许多误解。

4. “本土化”在意义上比较清楚。其终极状态是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而“本土心理学”很自然地是指研究当地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知识体系。这个意义与主张“中国化”、“本土化”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想要中国社会心理学终究成为的状态是完全吻合的。所以，我主张用本土化一词。

如何使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

在澄清了名词及意义上的混淆之后，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可以使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心理学”。

根据前面所述有关本土化运动的发展历史，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心理学之所以不能发展成为一门真正描述及解释中国人社会行为之学问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学者在作研究时，太过依赖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方法及理论。所以，要使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必须先从中国社会心理“研究”的本土化做起。而什么又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呢？那自然是使我们在作研究的时候，由“非本土”的、过分依赖外国的态度及作法，变为“本土的”态度及方向。这个终极状态可以称为是“本土研究定向”（indigenous approach）。

那么，什么是“本土研究定向”呢？简单地说，是一种“用当地人经过当地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的浸淫之后的心理及行为表现方法及方式，来观察及研究当地人”的研究态度及作法。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要如何采取“本土研究定向”来研究呢？那就是要先寻找

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环境浸淫之后的心理及行为表现方法及方式，然后再来观察、描述及解释个人的社会行为。

我认为采取这种“本土研究定向”的研究者，在作社会心理学研究时，必须特别注意依循以下几点方针来作研究，当可使中国社会心理学走向本土心理学的道路：

1. 以实际观察中国人所得的社会行为现象为研究课题；
2. 选择中国人所熟悉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为研究对象；
3. 考虑中国文化、社会体系反映在个人心理体系（包括语言意义系统）的状况，来找出中国人行为的真正社会心理意义；
4. 从而，来寻出适合研究中国人社会心理的设计及工具；
5. 用以发展能解释中国人社会心理及行为的模式与理论；
6. 依此来建构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具体办法如下：

（一）充分利用本土的材料

采用本土研究定向的人，以观察、了解及解释当地人日常生活所表现的社会行为现象为主。例如，“为什么中国人在大庭广众喜欢大声说话？”、“为什么中国人不当众拆开别人给的礼物？”等，并不限定研究的题材必须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如气功、针灸、书法等。他们也不只是去寻根溯源，去挖掘并整理传统的、与心理学有关的概念，虽然这部分工作所得到的宝贵材料，是任何一个采取本土研究定向者所不可缺少的。因为传统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现代的中国人。

采取这种本土定向的人，在作研究时强调采用当地的自然产生的素材，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发现中国人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什么心理思维。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的行为。这些素材可以是中国人特有的，可以是传统的，可以是神话、民俗、文学、绘画、音乐等。一般社会及文化观察家、批评家及改革家如柏杨（1985）及孙隆基（1983）的材料，都可以采用，只是不能停留在这些作者的自哀自怨及嬉笑怒骂之中，而是要用社会科学的角度及研究训练，来更深层地去了解这些外表的行为。当地的素材也可以是来自对当地人进行的观察、调查、测验、实验等的结果。不过，用时要小心解释它们的意义。这里强调对研究素材的选择不在于其形式，而在这个内容是否能让我们真正了解中国人的行为。

（二）探讨本土的概念

发掘及发展本土的、当地人常用的社会心理概念，而用它们来作研究对象，是本土研究定向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过去在过分依赖外国社会心理学的时期，我们在作研究时，选择什么概念，完全是“照搬”，没有去考虑这些“进口”概念到底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有没有？即使是有，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个概念，与外国人脑海中的那个概念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时时犯了研究结果“牛头不对马嘴”的毛病。

探研中国人当用的词汇及分析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来找出我们用以看某一问题的概念是很重要的。从中去研究我们的思想、看法及我们的世界观，可以更彻底地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行为背后所含的意义。语言是用来表达我们内心的世界及思想的，同时它也限制了我们的世界及思想，所以从当地人所用的语言及所采用的概念，我们可以更清楚、贴切地了解当地人怎样思想、怎么看问题、怎么看世界，及为什么这样思想、这样看问题、这样看世界？

（三）透过对文化、历史及社会的了解，寻求中国人表现社会心理的方式

任何一个人都是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历史阶段及社会制度之下的。社会化的过程，使每一个人都将这些文化价值观、历史沉淀及社会制度所内涵的逻辑，转换成自身对事、对人、对世界的看法的“部分”，从而影响了个人的行为及其表达方式。然而，个人的行为也绝非文化、历史及社会所形成的大模子下刻出来的小模子。个人作为“人”有自己的需求，他的行为也必须满足个人的需求。所以它应该是调适“个人”在“社会”中所必须尽的责任，及满足个人需求的一种妥协结果。每个人的对事、对人、对世界的看法，正反映这种妥协调适的结果。

当我们要了解在一个文化下生活的人的行为时，就必须仔细研究这个文化是如何界定“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从其中找出它对“个人”的要求，再从其中去探讨“个人”如何协调这种要求及作为“人”的需求。进而可以了解为什么当地人会有他们的想法、看法、人生观及世界观。一旦我们对这个框架有了解之后，我们再去解释当地人的行为时，就可以利用这个框架。甚至可以透过这个框架去了解外表行为的更深层意义。如此，使我们能达到真正了解他们行为的目标。

采取这种态度及作法来作研究，是“本土研究定向”的精髓，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社会心理真正成为描述、解释、关于当地人的本土知识体系。

(四) 不排斥外国概念及理论

国外一些心理学家对一些问题起步较早，因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及成果。我们在试图了解自己的行为时，当然应该吸取他们的经验及成果。但是，正如我在另文中曾详细阐述（杨中芳，1987）身处社会科学边缘地位（叶启政，1984）的中国港台的社会科学，在过去几十年来吸收外国经验中，经常是让外国的经验及理论套住了我们的思想，架空了现实情况，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支离破碎，变成围绕外国概念及研究的佐证。而对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同社会结构及价值体系下的完整的中国人，是怎么思想、怎么行动的了解缺乏一套完整的概念及理论。

由于外国人及中国人都是“人”，共性显然大于差异性。外国概念及理论虽然有时不尽可能描述中国人的情况，但是它们经常可能帮助我们看到许多“人”之常情。借助与它们的对比，我们也看到自己与外国人的不同，因而能够更了解自己。因此了解外国概念及理论是帮助了解自己的利器，本土研究是包括善用外国材料的。采取本土研究定向的人，只须认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不让外国概念及理论“喧宾夺主”即可，并不需要排斥它们。

最近有关将西方的公平法则，“多劳多获”法则，应用在中国的情况，最能说明我这里的论点。最近国内媒体报道，“多劳多获”法则应用到中国许多工厂及企业之后，发现衍变成“奖金津贴按人头分配”的集体加工资，并未充分发挥“多劳多获”的原本效用。这么一个在外国试验成功的理论，拿到中国来实行时，为何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益？我觉得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体系制度是建筑在一个“均”之上，而西方的体系制度是建筑在个人的自由自主之上。前者注重收获的平均分配，而后者注重机会的均等。因此“多劳多获”在西方社会是公平竞争下合理的分配。而在中国社会中，完全西方式的“多劳多获”是造成社会不合谐的动力。我不知道“多劳多获”终究是否可以在中国得道，但是至少像目前这样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应用在中国，实践的证明是行不通的，主要是没有考虑两个文化在体系制度及价值观

的差异。

(五) 要研究完整的中国“人”

与采用外国概念及理论有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本土研究方向是否排斥研究人的共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研究人的共性像是勾划出了一个无血肉的骷髅架子；要见到鲜活的、完整的中国“人”，我们必须加添上血与肉。而这些添补血与肉的工作，必须靠我们把自己放在中国社会结构与制度、及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之中来研究，才能成功。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这里的论点。各位熟悉社会心理学的人，都知道安德森教授的认知信息统合理论（Anderson, 1965）是一个常被用来了解人类印象形成过程的理论。在中国，我也看过他的理论几次被验证。然而他的理论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人类所共有的空壳子。让我们知道在印象形成的过程中，一般人把有关别人的信息（描述别人的形容词），在经过加权的处理后，把它们加起来成立一个对别人的总印象。但是，许多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在支持了安氏的模式之后就停了下来，而并没有更进一步根据他这个人类基本的认知统合模式，去探讨到底中国人在印象形成时，哪一些形容词的信息会成为加权较高的信息，因而成为 Asch（1951）所谓的“中心特性”。而中国人的加权方式及过程如何，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人常用的两分看人法则，“把好人捧上天，把坏人踩到地”。

（六）建立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知识体系

最终，持有本土研究方向的人希望能在试图了解本地人的行为之余，揣摩出一些解释自己行为的模式及理论；进而，累积各种的观点及角度的模式及理论来建立起一个个的知识体系，从而把中国人的各种社会行为先用一条线、一个架子，贯穿组织起来成一套理论。然后，再经综合不同学者所构成的不同的理论，而能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个终极目标虽然离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现状还很遥远，但是我觉得它会是采取本土研究定向的必然结果。

参考资料

何秀煌（1982）：《从方法论的观点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國化问题》，杨国枢、文崇一合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柏杨（1985）：《丑陋的中国人》，香港：艺文。

孙隆基（198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香港：壹山。

杨中芳（1987）《试谈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社会学研究》，第4期。

杨中芳（1988）：《欲速则不达：试论发展社会心理学基础研究》，《社会心理研究》第1期。

叶启政（1985）：《边缘性与学术发展：再论科学中国化》，李亦圆、杨国枢、文崇一合编：《现代化与中国化论文集》。

Anderson N.H. (1965) .Averaging versus adding as a stimulus combination rule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70, 394-400.

Asch, S.E. (1951) .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s. In H. Guetzkow (Ed.) *Groups, Leadership and men*. Pittsburgh: Canegie press.

作者工作单位：香港大学心理学系

责任编辑：谭深